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集

社科院文研所近代文学研究组

中国近代 文学研究集



社科院文研所近代文学研究组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文学研究组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16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书号：10355·178 定价：1.80元

编辑说明

我国的近代文学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过去对它的研究极为不够，而且很少有专门发表这方面文章的园地。我们编辑这个集子，就是为了与同行们交流情况，以促进近代文学的研究工作。

本集所收各文，为我组部分同志和近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所写。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我们在编辑时，充分尊重作者的观点，只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我们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很不够，编辑这样的集子更是第一次，其缺点和错误必然不少，谨请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 录

近代文学的变革与发展·····	赵慎修	1
试论近代小说的演变·····	裴效维	40
论中国近代文学和鲁迅的关系·····	牛仰山	74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和诗歌创作·····	连燕堂	120
苏曼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裴效维	170
柳亚子早期诗歌浅谈·····	马 进	220
太平天国文学的评价问题·····	赵慎修	244
论金和及其太平天国时期的诗·····	王 飏	289
“两昆仑” 辩解·····	宋 实	324

近代文学的变革与发展

赵 慎 修

一

从1840年到1949年，时间虽不到一百一十年，但文学变动的剧烈恐怕是空前的，关于这一段文学史的分歧意见之多恐怕也是少见的。

第一，是应该划分为两个时代，还是应当联贯为一个时代呢？

目前，是以五四为界把这一时期分成了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但合为一代的意见也始终存在。

还在五四运动之前，文学革命之声刚起，就有人力图探索那次文学革命与清末文学改革的历史继承关系。钱玄同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①其后，

^① 钱玄同：《寄陈独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52页。

新旧文学的分野日益清楚，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新旧文学分界线的意义也日渐清楚，但是，许多人仍然强调指出前后两次文学改革的历史联系。例如，周作人就认为清末梁启超等人已经造就了文学革命的形势，如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五四文学革命则是收水到渠成之效。^①郭沫若不止一次地讲过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渊源。1930年他在回顾文学革命的历史的时候说过：“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表征，所以这个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溯到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其他如严几道、林琴南、章行严诸人都是这个时期的人物。林与章在几年前反对白话文的运动非常剧烈，其实他们自己在文言文的皮毛之下，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在做离经叛道的勾当”。^②1943年，他又指出，新文艺的发轫期“应溯之于前清末年，虽然当时的先驱者们在其意识上并不十分明确。”^③朱自清在追溯新诗发展的渊源的时候，也说清末的“诗界革命”虽然在诗歌创作上是失败了，但“在观念上”却对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④其他，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也都把新文学的演变追溯到清末。

总之，在五四以后的三、四十年中是两说并存的，而且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似乎二说可以并行不悖。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② 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沫若文集》第10卷，第365页。

③ 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沫若文集》第13卷，第89页。

④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五十年代中、后期，划分时代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当时，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概念开始建立。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被截然划分为两段，界线就是五四运动。随之，似乎是援引史学界的成例，^①把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也分为两段。即以五四为界，分为中国近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

日久天长，许多同志觉得这样划分文学史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但也使另一些同志觉得这种切割有许多不便，在理论上和史实上都有难以解释之处。研究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的同志感到，不研究清末不可能弄清其“来龙”；研究近代文学的同志则感到，如果不研究五四文学革命则不能弄清其“去脉”。于是，一些文学论著仍在探索五四文学革命与清末文学改革的继承关系。如唐弢同志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仍然把清末文学改革当成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导。刘再复同志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则认为鲁迅的美学思想与近代美学思想有着血缘关系。鲁迅曾吸收了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两极。更进一步，有的同志则提出了打破通行的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界限。1980年，姚雪垠同志致信茅盾，主张现代文学史应该包括黄遵宪、梁启超、苏曼殊，以及南社等人。^②茅盾不但同意姚的主张，而且说他早有此意。^③姚雪垠和茅盾虽然沿袭现行的现代文学的概念，但实质上却突破了它的格局。1982年，陈学超同志又提出，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这一百多年

① 姚雪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方法》，《新华月报》文搞版，1980年第5期。

② 茅盾：《梦回琐忆》，《文艺报》1981年第1期。

的社会性质相同,文学主流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内容,以使用白话、描写现实、模拟外域、注重小说等为追求形式,以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为理论主导,应该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①

总之,1840年到1949年之间的文学史,始终存在着分与合的争论。

第二 是近代文学的变革的起点问题。

凡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的无不注意文学的变革,力求确定一个变革的起点,寻找代表性的作家、口号和事件,以便研究变革的发展进程。

回顾近代文学的研究进程,可以发现关于近代文学变革的起点的说法是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提前了。当仅仅有新旧文学之分,而没有近代与现代之分的时候,一般把新文学的起点定得较晚,或到梁启超,或到王国维,或到黄遵宪,很少上溯到龚自珍与魏源的。而到了区分近代与现代,确定了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中国历史起点之后,近代文学变革的起点便也随之提前到了龚自珍时期。总计关于近代文学变革的起点有以下诸说:起于龚自珍、魏源说;起于太平天国说;起于黄遵宪提倡“新派诗”说;起于夏曾佑、谭嗣同提倡“新学之诗”说;起于梁启超提倡“文学革命”说;起于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说。

那么,其中的哪一说较为切合实际呢?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是关于近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问题。

① 陈学超:《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应该有其基本线索。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探索这种基本线索。钱玄同根据梁启超提倡小说、提倡戏曲，提倡以新名词、俗语和日本语法进入散文，断定梁启超的文学改革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同属于一个文学发展系列，因而也就称颂梁氏为提倡新文学的第一人。郭沫若考察近代文学的发展线索的着眼点是它的资产阶级性质。他正是发现了梁启超时期的文学改革，和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同属于资产阶级性质，所以才断言五四文学革命的滥觞时期在清末。近二十多年来，近代文学的开端时间上移了，于是乎人们又试图寻找从龚自珍开始，能够一直贯串近代文学史的发展线索。人们认为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我国文学就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出现了为反帝反封建斗争服务的进步文学潮流，龚自珍就是近代文学史的开山大师，从龚自珍开始，进步文学潮流就构成了前后相承的关系。

那么，哪一种说法比较科学呢？近代文学史上有没有自始至终贯串一百一十年的发展线索呢？

面对这样的分歧，根据我的粗略的研究，我以为从1840年到1949年的文学史应合为一代，这一划时代的文学变革出现在戊戌变法之后，这个时代文学变革呈现出多元的特点。从思想内容方面看，出现了由封建时代的民主性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从文学继承关系看，由单纯的中国文学的纵向继承关系，转变为面向世界的横向继承关系；从文言语言上看，由文言转变为白话；从文学体系的结构关系来看，由杂文学转变为纯文学，由诗文为正宗、小说戏曲为附庸，转变为以小说、戏曲为上乘。一句话，

那就是由古代文学体系到近代文学体系的转变。至于这一时代的名称，可以以社会性质和时间界限命名，也可以以近代命名。近代、现代之类的名称，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它本身也将是一个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的名称，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但为了顺口，为了与古代相衔接，目前仍不妨叫做近代文学。

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近代文学的变革与发展过程进行一次粗疏的描述。为此，权且把近代文学划分为三个时期。

二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为近代文学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有许多优秀的诗歌与散文，但还没有出现近代文学的全面变革，在整体上还是古代文学体系的持续和衰落时期。文学的变革虽有，但还限于某些新题材，新文学还只是处在酝酿阶段，充其量不过是处于萌芽阶段。

这个时期，东西方的资本主义列强屡次入侵，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屡屡签订，中国的封建经济已经逐步解体，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一部分意识形态，也伴随着侵略战争的腥风血雨传了进来。我国一部分有识之士也开始睁开眼睛观察世界，中国开始派遣驻外使节和留学生，一些人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新学著作已经大量问世，旧学已经受到相当的冲击。但整体说来，就社会思潮来说，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即以旧学改造西学的时代。

这一时期，前后两段社会运动的性质已经很不相同。

太平天国还是旧式农民起义，它的失败意味着旧式农民起义的悲剧式的总结。戊戌变法则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运动，虽然以悲剧收场，却启示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到来。但整体说来，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斗争还处于旧民主主义的初级阶段。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国社会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来，已经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从那个时期以来的多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都是为了实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只是到了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①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可以说，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却是处于初级的、不完全的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文学的发展状况，作家的阶级属性，文学的题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毕竟还没有发生划时代的文学变革。我国文学自然有光辉灿烂的历史，各种文学体裁都产生过足以令人夸耀的作家与作品，经历过它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时至清朝中叶，又毕竟都进入了衰歇时期。进入近代社会之后，虽然产生了一些诗歌与散文的佳作，但毕竟又不能使中国文学振衰起敝，别开生面。以诗文为正宗，以文言为正宗，纵向继承的文学体系在这一时期始终没有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它作为近代文学的第一个阶段。

这一时期的文学派别很多，落后的文学流派还相当强大。如桐城派古文在这一时期竟然还经历了它的“中兴”。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0页。

我国散文的发展当然是源远流长，但到了明代之后，也已经到了衰歇时期。一些散文家往往不是锐意进取，而是以复古相标榜。到了清代桐城派的出现，这种倾向就更加显著。方苞讲究文章的“义法”，刘大櫆讲究文章的“义理、书卷、经济”，姚鼐讲“义理、考据、词章”，方宗诚讲“义理、经济、事实、考证”，姚莹讲“义理、经济、文章、多闻”，但在实质上是把“文以载道”具体化。桐城派“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诸体裁的词句入文，^①实际上是给散文这种体裁规定了清规戒律，剪除了枝叶根茎，使它规范化，模式化，僵化。它名为继承唐宋八大家，以至司马迁和班固的优秀传统，实质上却把散文这种体裁弄成了木乃伊。它务求散文的雅驯，却也矜持；务求清通，却也空疏。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桐城派古文已经面临“道丧文敝”的危机。不仅其他派别攻击它，就是桐城派中的人也有异议。当时，梅曾亮号称姚门四杰之一，又身处京师，俨然是桐城派古文的传人。但他竟然表白说：“向于性理微妙未尝窥涉，稍知者独文字耳，”^②又说过：“文诚工，何关道之丧。”^③曾国藩出于桐城派，他了解这一派古文的弱点，到后来也别有所宗。^④但他们都对桐城派古文采取

① 吴德璇：《初月楼古文绪论》。

② 《答吴子叙》，《柏枧山房文集》卷2。

③ 《李蕴山时义序》，《柏枧山房文集》卷6。

④ 曾国藩咸丰11年6月29日致沅浦信中说：“（对于桐城派古文），国藩少年好之，近十余年来亦别有崇尚矣！”即指此而言，转引自赵增晖《曾国藩言行之体系》第51页。

修补的态度。特别是曾国藩以其“中兴功臣”的社会地位，起到了重新振兴桐城派古文的作用。

曾国藩写作《圣哲画像记》，把汉学与宋学的祖师都列为圣哲，把“义理、词章、考据”统一到孔门四科之下进行了重新解释。他编辑《经史百家杂钞》，取材范围扩大到儒家经典，进一步把桐城派古文的文统和儒家的道统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个派别更具有权威性，从而使这个派别重新振兴起来。

鸦片战争时期和太平天国时期有一批作家，他们可以写出一些忧国忧民的作品，也曾经对当时文坛的某些不良倾向进行过批评，但他们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作品都可以说没有超出古代文学的体系。

他们不满意文坛，但却只知求助于古人。张际亮在鸦片战争以前就猛烈地抨击过清代诗家诸派，指责朱彝尊只知道以运用奇字险韵为工，翁方纲是以考据为诗，沈德潜“堕于理障”，袁枚是“野狐外道”，当时的诗坛是“荒陋粗疏，纤翳谲怪”，批判的激烈程度远出乎时人之上，但他却说：“今欲救海内为诗之弊，宜寻沧浪读书穷理之说以主人。”^①救世之方不过是严羽的《沧浪诗话》。姚莹指责当时的诗坛“淫哇俚唱，竟出驰声”，“诗道极坏”，但他也认为诗道之坏的原因在于“以法古为耻”。^②姚燮也主张“诗必法古”，只是觉得“顾法古人而但蒙其面目，则性情亡矣”，应当“辗转求质，譬诸病者听于

① 《答朱秦州书》，《张亨甫全集》卷1。

② 《松坡诗说序》，《东溪外集》卷1。

医，莽夫拘于法，然后乃相安于自然”。①

他们同情民生疾苦，指责官府的横征暴敛，但其思想仍然是白居易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其怨与刺的极限仍然超不出杜甫的“盗贼本王臣”的思想。魏源的《江南吟》，陆嵩的《鬻儿行》，林昌彝的《市价行》，鲁一同的《荒年谣》，姚燮的《哀雁》和《岁暮四章》，黄燮清的《吴江姬》，贝青乔的《雨中作》和《自临安至于潜夜宿淙溪旅店作》，金和的《读诸院司判牍书尾》，郑珍的《经死哀》等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诗篇。林昌彝的诗句“嗷鸿百万集中野，长官携筭上高楼。心伤赤子流离日，眼看贵人歌舞秋。休休休，伊谁请剑斩而头”；姚燮的诗句“邈泽民饥千灶冷，常平粟朽万仓封”；贝青乔的诗句“村农告瘁思悬糶，山贼乘机竟揭竿”，“何当寄语催租吏，稍许耕桑手足宽”，都是这一类的警句。

上述作品当然是优秀的，但我们从文学发展的意义上把它们划入古代文学的系列也并不意味着任何贬低的意思。

对于这些作家、流派的评价可能不一，但涉及到他们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可能不会产生多少争论。

有争论的是从龚自珍开始，到黄遵宪和维新派诸公，以致于到梁启超的文学革命、五四文学革命能否构成一个前后相承，层层递进的发展系列。

许多同志以为能够构成一个系列，我却以为未必。

首先是龚自珍。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思想，以公羊学的三世说批判社会现实，以《易经》的“穷则变，变则通，

① 徐时栋：《姚燮诗传》，见《复庄诗问》。

通则久”的思想呼吁变法，以及他的思想深刻，构思奇特的散文和绝句都足以使他卓然成家。他对后世也的确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以致于晚清时期曾经出现过一个“定庵热”。但如果仔细分析，则可以明白龚自珍的影响因为时代不同而不同，人们对他的褒或贬的出发点也不相同。梁启超自述其思想变化说是“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浅薄”，^①是指对龚自珍的今文经学的变法思想的认知的变化。当初，资产阶级维新派从龚自珍那里借取了一部分批判现实、呼吁变法的武器，所以感谢他，仰慕他；后来又从日本和西方借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也就把龚氏置诸身后了。章太炎贬斥龚自珍和魏源的文章都是“伪体”，龚氏之文“文词侧媚”，“桃达无骨”，深深慨叹“自自珍之文贵于世，而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妖耶”？^②其实质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反满与不反满的分歧。柳亚子在1908年称赞龚氏是“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③是称赞他奇丽的文思和纯熟的诗歌技巧。晚清以至民初，集龚成为风气，但和集唐一样，并不能看成文学上继承关系的重要根据。

总之，龚自珍是鸦片战争时期的重要文学家和思想家，但他自己并没有提出文学改革的理论。他的影响很大，但最重要的影响是在戊戌变法以前。

从七十年起，陆续出现了一些宣传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报刊和专著，黄遵宪自称为“新派诗”，在政论文与诗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② 章太炎：《校文士》，《中国近代文论选》下，第445—446页。

③ 柳亚子：《论诗三截句》。

歌方面显出几分的新气象，一些同志曾经以此作为近代文学新变革的起点，力求理出一条发展的线索。这当然是有一定根据的，但切不可忽略了这个时期文学变革的二重性。

所谓文学变革的二重性，其一指文学题材的新与文学思想、文学风格的旧。当时，薛福成出使西欧，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自称“闻见恢奇，稍有论述，直抒胸臆”，^①他写了一些记述西欧见闻的散文，但他仍然称颂曾国藩师法桐城派古文，光大桐城派，为“一代伟人”，不仅可与方姚诸公并峙，而且“几欲跨越前辈”，断言“桐城诸老所讲之义法虽百世不能易也”。^②王韬东渡日本，写作《扶桑游记》；西游欧洲，写作《漫游随录》，都写了资本主义的新事物。他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淞隐漫录》也写到了外国的人物。但他在外国仍然以文学大国的使者自居，在物质文明方面自愧不如人，而在文学与文化方面却是以优胜者自居的。他论述诗歌的创作反对“宗唐祧宋以为高，摹杜范韩以为能”，主张“自有一家面目在”，^③主张在唐宋诸大家之外，“别树一帜，自辟畦町，独立门户”。^④这种文学主张比单纯以拟古为能事的要高一筹，但毕竟又和近代文学变革的潮流不可混同。冯桂芬有《校邠庐抗议》一书传世，常被视为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① 薛福成：《庸庵外编自序》。

② 薛福成：《寄龛文存序》，《庸庵外编》卷2。

③ 《蘅花馆诗录自序》，《彘园文录外编》卷7。

④ 《小淑村诗钞序》，《漫游随笔·扶桑游记》第29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